

康巴地区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难点与对策

李娜¹

(四川民族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 康定 626000)

【摘要】: 康巴地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支持促进作用。分析了普惠金融实践过程中现有金融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金融人才、金融创新不足等难点, 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推动康巴地区普惠金融发展, 促进康巴地区乡村振兴。

【关键词】: 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 农村农业 藏区

【中图分类号】 F832.7; F327 **【文献标识码】** A

乡村振兴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工业农业协调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建成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在加强乡村振兴战略要素保障中强调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机制, 扩大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融资范围, 发展农业保险。可见, 乡村振兴要全面实现, 金融支持必然少不了, 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 传统金融如何向普惠金融转型, 普惠金融如何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种养加结合和产业链再造, 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解决好“三农”融资、信用中介问题, 构建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既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大任务, 也是破解乡村振兴金融瓶颈的关键所在。

1 我国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难点

甘孜州是国家划定的“三区三州”中的四川藏区, 是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虽然 22.3 万名贫困人口、1360 个贫困村、18 个贫困县在 2019 年底实现了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至 0.23%, 但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 农牧民收入稳定性差、返贫压力大, 乡村振兴是助推农牧民稳定脱贫、全面奔康的重要保证。因此,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金融面临着诸多难点和痛点, 依赖传统的工作理念、方法、机制、平台、政策等难以有效解决“三农”金融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康巴藏区有其特殊的人文、地理、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相对于内地仍面临诸多困难。普惠金融在康巴藏区推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会面临更高的金融服务成本和金融信贷风险, 面对康巴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会对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出挑战。

2019 年来, 在甘孜州人民银行的推动下, 州政府、财政局及相关产业部门先后制定印发了《甘孜州财金互动“政银担企户”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农业产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实施方案》《甘孜州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实施方案》《甘孜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分工方案的通知》《甘孜州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调查制度》, 为确保系统全面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了总指南。州人民银行不断创新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方式与方法, 不断推进普惠金融与特色产业经济相融合。

创新“信用+再贷款+信贷+租赁+就业”模式。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纳入县域政府目标年度考核范围, 依托村“第一书记”、村长等金融联络员深入开展“信用创建”, 对县域农村信用社匹配一定的再贷款额度, 农村信用社积极创新农户信

¹**作者简介:** 李娜(1986-), 女, 湖北潜江人, 讲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与金融。

基金项目: 四川民族学院人文社科项目: “相对贫困视角下甘孜藏区金融发展问题与对策”(项目编号: XYZB18040SB); 四川民族学院孵化项目: “康巴藏区普惠金融推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KBFHB20019); 甘孜州社科联项目“后疫情时代甘孜州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gzsk202005)阶段性成果

贷产品，先后对该村信用用户累计发放高额纯信用贷款 1200 多万元，单户农户信用贷款额度可高达 50 万元，实现了信用价值与信贷政策的升级运用，成功打造“每户守信，全村致富”模式促进了信用示范村全体农户增收致富。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显著改善康巴藏区农村金融生态，信用用户信用村建设对于农村居民的金融观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对于未被评为信用用户信用村的存户，贷款难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不具有普惠性。

甘孜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为主要载体，通过示范村平台，围绕村基础设施、产业、乡风文明等发展规划，提供一整套全面的现代金融服务。“1”，即示范村；“7”，即在每个示范村推广一种新型支付方式，建立一个助农取款点，确定一名金融联络员，发放一批扶贫小额信贷，培育一个产业，评定一批信用用户，创建一个信用村；“N”，即为示范村提供存款、取款、转账、购买国债、纳税、金融政策宣传、金融产品介绍、农户经济调查、农牧民金融夜校等多种普惠性现代金融服务，且随时可以加载更多的现代金融服务，彻底解决了农牧区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2019 年末，通过“1+7+N”模式在示范村提供的综合金融服务已经实现交易量 6.86 万笔，金额 10637.04 万元。这种模式看起来服务十分完善，对于示范村的金融支持较为充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金融服务供给过剩，而对于非示范村又同样不具有普惠性，非示范村的广大农村的融资约束现象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保险+牦牛”的养殖业普惠金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殖业的高风险问题，可是该模式的本质是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开发了牦牛险种，并非金融机构通过自身保险方案设计完成的普适性的金融产品。“金融维稳+乡村治理”模式是通过政治维稳的干预模式，通过金融机构人员深入农村农户了解民情，帮助解决部分金融资金需求，促进农村稳定与发展。上述模式在短期内对于缓解农村金融约束问题有一定的作用，由于政府项目、政治任务都只具有时限性，往往在任务结束后就无法形成金融服务与产品供给。

甘孜从让项目跟着需求走、金融资源跟着项目走、产业跟着市场走、收益跟着农牧民走等四方面入手，金融产品服务定价按“收益覆盖成本加风险”执行，且围绕示范村、农牧民、企业、合作社开展全方位的金融综合服务，建成一个个利益联结共同体，将过去传统的“交易”变革为“交友”，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利益均沾。

甘孜州党委及政府与人民银行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甘孜富民产业发展做了诸多的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让康巴藏区部分产业、乡村和农牧民缓解了金融约束之急。但是，普惠金融不是政府一时的政治任务和一个项目任务所能解决的。普惠金融是一种可以让所有农村居民百姓都可以低成本轻松享受到的服务，通过金融服务可得促进生产生活改善，实现藏区乡村振兴。

2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金融普惠难的原因分析

康巴藏区的普惠金融在缓解代表性企业、乡村产业和农牧民发展方面做出了诸多创新，较大程度地缓解了康巴藏区发展的金融约束问题。但是，要实现全体百姓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普惠难题，仍然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分析改进。

2.1 康巴地区现有金融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较于内地仍然较为落后和弱小，产业发展单一、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性与消费性金融混杂。以甘孜州为例，普惠金融事业主要由州人民银行推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农商行等几家商业银行作为政治任务落实。几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周内的网点较少，只有农业银行和农商银行在全州 18 县的县城有网点，工行、建行只是在康定市有服务网点。甘孜州地域面积达 15.3 万 km²，除了少数离县城较近的村镇和居民能够去银行，更多偏远地区的农牧民的金融需求较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服务。这样的金融供给分布格局与藏区小而散的金融需求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经营大户、家庭农场等一系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其经营规模接近商业化规模化生产水平，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较多，对于资金需求量仅靠自身积累难以得到满足。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创业初期，存在抵

押物不足、经营风险较高等情况很难随时以较低成本获得中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供给。

2.2 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不够

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全局性、长远性制度部署，政治运动式的任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不长远。近年来甘孜州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和农牧生产，对于推进重要项目解决重点困难群众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康巴地区农牧民和小企业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牧民没有足够的银行认可的可抵押变现的财产性资产。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其经营首要考虑的是收益与风险的匹配，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于藏区农牧民和小企业这类零散的金融需求对风险的控制尤为严格，由此必然导致银行没有内生动力发展普惠金融。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使用权和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上述财产在确权、颁证和流转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安排。如果政府能在权属问题上从制度层面予以确权颁证促进流转，现有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事业上内生动力将大大增强。

2.3 康巴地区现有普惠金融政策并没有触及到普惠金融的根本问题

金融是要追求盈利的，普惠金融也不例外。普惠金融的盈利可能要低于传统金融，但是仍然是追求“金融产品定价=成本覆盖+风险补偿”，而风险补偿主要源于农村地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既有农户触网程度低的原因，也有技术应用层面的原因，更有现有金融机构没有动力去摸清基础数据的动力。政府能够推行金融维稳的政策，却没有想过利用金融维稳人员和各村派驻的第一书记去摸清农户的基础经济信息，通过金融政策宣传和教育让农户主动申报家庭经济数据信息从而有效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

2.4 金融人才匮乏导致金融创新不足，普惠金融难普惠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有差异，康巴藏区产业发展更具有其独特性的一面。康巴藏区抵触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地理位置偏远，气候干燥海拔高，康巴藏区的农业大多是特色鲜明、规模较小的林下经济半山农业和高原畜牧业。例如，在康定市、泸定县发展较好的达杠苹果、黄草坪苹果，年产量都能达到数千吨，高原糖心苹果产业初具规模，但却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开发适应果农需要的金融服务和促进果农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苹果金融服务；在康定姑咱镇沿线乡村，众多乡村在发展羊肚菌产业，针对羊肚菌的种植、营销、加工等环节特定的金融需求基本处于金融供给空白状态。金融服务不融入具体产业和产品，必然面临创新困难，普惠困难。康巴藏区特色产业、特色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农业畜牧业旅游业都在蓬勃发展，藏区农牧民的生产金融需求、生活金融需求大量增加，我们的金融机构却面临害怕风险不敢贷不想贷，只是简单地提供存款、汇款和基本贷款服务，产品服务创新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无法与特色产业经济融合发展。

3 提升金融普惠的对策与建议

普惠金融是为改善农村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增加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机会，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资源获取成本的长尾金融市场。普惠金融需要面对广阔地域、分散的人口、小额度高频率的金融需求。因此，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根据金融需求特点提供小而精的金融服务。

3.1 提升地方政府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和领导水平

地方主政领导对于普惠金融认识的偏差是直接导致普惠金融普惠难的重要原因。过去政府机构可能存在这样的认识偏差，普惠金融就是一项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是暂时性的。传统金融机构认为普惠金融不挣钱、风险高，对于银行经营来说是负担。但是，随着国家对农村的重视，脱贫攻坚全面转变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普惠金融将是未来又一金融蓝海市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推进，普惠金融将成为这场战略能否早日实现的关键因素。

3.2 引进培育小微金融机构，增加金融市场竞争，缓解金融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矛盾

传统金融机构的市场中心趋向于向城市转移，习惯于城市化地区经营，对于农村资金需求小而散的普惠金融没有经验和精力。目前，康巴藏区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几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为主，缺乏竞争，没有业绩经营压力，很难有动力深入农村金融市场。引进更多金融机构，通过竞争让更多金融机构加入到市场竞争中，促进传统金融深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普惠金融需要熟悉农业生产经营特点，熟知农村经营环境的小型金融机构，愿意对农村金融市场精耕细作的金融机构，培育小微金融主体深入到传统金融机构“不愿做、不会做”的金融市场中去。

3.3 加强金融机构间协调，共建普惠金融数据信息系统，改善金融生态

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普及金融服务，让农村、农民在日常生产经营收支中不断触媒，增加金融基础大数据。适度投放金融存取支付等基础设施，借助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确保乡村生产消费金融服务覆盖无死角。协同建设普惠金融数据库，逐步完善农村信用环境，有效提高农村金融资源可得性。

3.4 提升普惠金融地位，加大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形成利益协调的政银担普惠金融体系

一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增强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也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建议在对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考核中，对支农惠农、乡村振兴投入力度较大的机构给予更多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奖励，为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协同政策支持。此外，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注重整合财政、金融、信贷、担保和互助合作社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为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政策支持，进一步降低农村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和增强金融资源可得性。

3.5 引进培育了解藏区、扎根藏区的金融从业人才，改善金融体系服务能力

人才是推动金融体系变革、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关键。全国已经有部分欠发达地区在普惠金融创新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针对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难点能够运用新金融理论、新技术方法、新思维观念扎根农村一线研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难点与卡点，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实动脑筋想办法出主意。

3.6 激励金融创新，鼓励开发促进藏区特色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针对乡村经营者正规渠道融资意识薄弱和抵押物不充足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对符合其经营需求的金融服务进行普及介绍，发掘乡村各类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应当因地制宜开展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解决抵押物不足的问题。乡村振兴必须向产业融合方向发展。不同地区产业融合情况不平衡：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链条相对偏短，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越是欠发达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潜力越大，越需要资金的支持，但获取金融支持的难度也越大。因此，普惠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支持，让金融服务渗透到乡村振兴发展的每一个领域、每一道生产环节，通过普惠金融创新促进每一个产业、产品实现发展，不因缺乏资金而让一个好的产品、项目夭折。

参考文献：

[1]赵周华.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一理论阐释、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金融发展评论,2018(11):134-144.

[2]祝国平,郭连强.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问题、深层原因与战略重点[J].江汉论坛(人文科学版),2018(06):46-54.

[3]李秋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本模式和路径选择[J].闽江学院学报,2014(01):118-124.

[4]李宏贵,熊胜绪.中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探索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0(03):24-28.

[5]罗国锋,王金玲,周超.五所世界名校创业教育体系的经验与启示[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3(02):92-96.